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金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上海，而农村金融濒临枯竭。“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往海外”，这成了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1934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的发达，一切现金财富均集中于上海，每年估计达数千万元……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他认为，中国内陆省份和上海的前途，确已同样酝酿着一个极大的

危机。

浙江的情况相当典型。

20世纪20年代，浙江的金融情况相当不错，在嘉兴，庄票“到期取现，信用昭著。即有未到期之票，持票人到出票之钱庄，先期取现，亦无不可，但所差未到期之日数，应由取款人贴还日息”。

到了30年代，“以内地社会农村现状观之，几人人人在荆棘地困苦艰难之中。无论巨富之家，概乏硬币储藏，其等而下之，即辅币亦皆搜刮殆尽”。

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金融枯竭

当时农村金融枯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外因则与1929年美国大萧条传导出世界经济危机有关。

文 | 本刊记者 萧翔宇



1933年七八月，农村复兴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属机构，1933年4月13日设立）在对浙江农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五六年之间，浙江从极富庶的阶段，一降而现出极度的衰落情形。乡村金融枯竭，借款大为减少。

陕西也广泛流传一句话，“两千鞭子打不出一块钱来”，反映出农村金融枯竭的严重情况。

农村金融枯竭，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是当时政局不稳，军阀混战。

1928年第一次国民政府全国财政会议上，将田赋划归地方财政。从此，田赋愈益成为地方政府的唯一财政支持。此外，沉重的捐税以及官僚豪绅地主向大城市转移现金是农村金融枯竭的重要原因。四川在军阀割据时期，更是将预征发挥到了极致。据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记载，1932年四川境内各军，预征最少的是黔军（侯之担的川南边防军，占据川南合江等地），共预征了14年；最多的是田颂尧的28军，预征了59年。电影《让子弹飞》里说“前任县长把税收到九十年以后”，虽是艺术加工，却也有着现实的原型。

外因则与1929年美国大萧条传导出的世界经济危机直接相关，这场经济危机不仅打击了我国工业，也对农业造成了重创。

农产品价格直接影响农民购买力水平。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中国的农业经济曾有过短暂的复苏和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扩大，西方国家为保护本国的农业经济，一方面纷纷筑高关税壁垒，另一方面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而彼时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市场的中国，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民成为这次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西方国家不仅通过贸易方式向中国倾销农产品，还采用政治手段，即通过“支付”借款的方式向中国倾销农产品。如1931年的“美麦借款”和1933年的“棉麦借款”，这两项借款不是以货币，而是以美国过剩的农产品——棉麦来支付的。变相进口这两类农产品，对当时的中国农业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因不等价交换，中国每年至少损失1.5亿美元。

据有关统计，中国大米的进口量由1921~1925年的

年均1850万市担增长至1931~1935年的年均2129万市担；小麦进口量由1924~1928年的年均880万市担增长至1929~1933年的年均2773万市担。与之相对应的是本土农产品的价格狂跌。在上海，1930年国产米平均每担为10.67元，洋米的价格为9.75元；到1933年，洋米价格下跌至5.27元，而国产米也不得不下跌至5.53元；在四年期间价格跌落了48.2%。其他农产品如小麦、面粉、棉花等也都如此。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和农产品出口的减少，农民收入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稳定。

倾销已使国内市场毫无招架之力，美国《白银法案》的实施，又加剧了中国农村金融流动性的短缺。在1934年前后，白银价格上涨，外流严重。自1932~1936年中国累计出超（出口额超出进口额）白银37905.3万两。

为了化解农村经济问题，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农村合作事业。在合作金融组织机构方面，于1935年4月设立中国农民银行，其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民银行条例》规定其宗旨为“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之改良进步”。1936年12月，实业部颁布的《合作金库规程》规定：“以调剂合作事业资金为宗旨”，决定设立中央、省及直隶行政院之市、县市三级合作金库，业务范围为存款、放款、汇兑及代收付业务。

但此举对农村合作金融事业的推进有限。根据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骆耕漠的调查，即使是在最著名的非官方组织华洋义赈会在河北发展合作金融事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合作社被当地有势力的人把持，土豪劣绅上下其手，将义赈会的贷款作为高利贷转借给农民等问题，一度出现了“集团高利贷”的现象。

究其原因，当时国民政府治理水平低下，基层组织被地方势力把持，他们常常利用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优势地位以权谋私。在土豪劣绅盘踞的基层，最需要扶助的底层贫农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实惠，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解决。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通过土改重建基层，中国农村的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